

# 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上）

“我们对党要有信心，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要为人民谋利益，不谋私利，不私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有公的思想，要切实维护好老百姓的利益。该晒黑的时候就晒黑，该掉皮的时候就得掉皮，人民群众的事耽搁不起。其实，吃苦也是一种享受”。这是李双成2004年12月10日在闽宁镇党委会上，给班子成员上党课时的讲话。

也就是在这一天，李双成上完党课前往永宁县委汇报会议情况，在路途中不幸遭遇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享年51岁。

2005年2月27日，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追授李双成同志为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并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在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深入开展向李双成学习的活动。

李双成，197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3月，任中共永宁县常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04年3月兼任永宁县闽宁镇党委书记；2004年11月任银川市政府研究室（扶贫办）书记、主任。

闽宁镇是移民吊庄乡镇，开发建设期间，由于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刚刚起步，经济发展慢，加之开发建设过程中遗留问题多，债务累累，水利工程建设中拖欠农民工工资无法兑现。移民怨言多，矛盾多，镇领导办公室每天都挤满了要账的人。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工作难以开展。许多干部都不愿意来闽宁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永宁县委决定由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双成兼任闽宁镇党委书记。李双成

挑起了这沉甸甸的重担，来闽宁镇解决突出问题。

肝胆相照，一诺千金。2004年3月4日，李双成上任了。在闽宁镇三级干部会议上，他说：“今天给大家服下一颗定心丸，我有决心在闽宁镇任职期间解决好老百姓的事，我会给闽宁镇两万多人民群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郑重的承诺道出了闽宁镇两万多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期盼，道出了对闽宁镇人民的责任和担当。

李双成梳理闽宁镇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带着干部下乡，深入村组农户家中，和老百姓面对面对谈，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他把调查反馈的问题整理成14类100多件，包括土地纠纷、蘑菇温棚户补助款、村干部工资待遇低、三级扬水工程试灌、农户过水桥、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闽宁镇小学缺少教室、教师等，对这些问题逐一制定措施，分类进行解决。

闽宁镇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因水利工程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上百万元，致农民工多次群体上访，给闽宁镇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李双成积极协调各方争取资金68万元发放到大家手中。

李双成足迹踏遍了闽宁镇每个角落。木兰村二组、三组140亩土地灌不上水，13户人没有路走，李书记解决了老百姓灌水难、行路难的问题。村民感慨地说：“我们遇到了真正为民办事的好书记了”。

一心爱民，热忱为民。李书记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也受过许多苦，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李双成书记深入农

户调查时发现，有几户农民生活特别困难。他自己买来大米、面粉、衣物等送给武河村张明虎、马富兴、李元、马梅等特困户。李书记自己掏100元钱给残疾人王连。他把自己家中的水壶、暖壶、脸盆、皮鞋、衣服等东西送给武河村困难家庭。调查走访时，李书记来到残疾人王彦刚家，看到他家境贫寒，没有看过电视，给王彦刚家送来了一台18英寸彩电，鼓励他们多看新闻，多学习发家致富的路子。

为了把武河村养殖小区的养殖业发展起来，李双成书记争取到了一笔帮扶经费，给武河村养殖小区50户人家，每户扶持2只羊，共100只。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李双成知道闽宁镇有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他赴杭州学习考察期间，与温州电子厂、美的服装厂、浙江绿地物业管理公司等处取得联系，共输出劳动力82人。全镇共输出劳动力4000余人，向杭州、北京、内蒙古等外省区输出劳动力450余人。当年劳务输出累计创收2008万元，切实增加了农民收入。

闽宁镇的教育工作落后，基础设施差，缺教室、缺桌椅、缺教材、缺教师。李书记积极争取海尔集团公司助学资金120万元，修建了海尔希望小学、铁东小学、玉海小学，解决了上学难问题。

面对困难学生、残疾学生无法入学的问題，李书记协调相关部门争取资金10.5万元，减免学杂费、书费，并争取35000元，给2004年录取的70名大中专学生每人补助500元学费。

披肝沥胆，鞠躬尽瘁。闽宁镇三

级扬水工程试水期间，由于三级扬水渠道是高垫方，渠道悬在高处。加之渠道是刚修成的新渠道，一旦被水冲开整个渠道就毁于一旦。李双成带领镇村干部，在炎炎烈日下和群众一起在渠道上守候了整整12天。他在17里长的渠道上每天要走三四个来回。

有一天晚上11点多，渠道发生决口，李双成第一个跳进水里搬运土袋抢险，十几个群众拿起铁锹堵住了堤口。三级扬水试灌成功了，老百姓笑了，李书记脸上露出了笑容。清清的渠水哗哗地淌进农田里，淌进了老百姓的心坎里，滋润了心田，赢得了民心。

临别上党课，情系闽宁镇。闽宁镇第一届二次人代会闭幕了，选举成功了。李双成站了起来，他激动地说：“人代会开得很成功，我非常感谢大家！”他给代表深深地鞠了一躬，会场上响起一遍又一遍的掌声。

下午李双成组织召开党委会议，这是他给闽宁镇党委新班子上的最后一堂党课。李双成说：“作为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要加强作风建设，更要转变思想观念。人民代表这样信任我们，把我们选举成领导，我们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只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任何形势下，要相信党，要靠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在思想上不能有丝毫动摇，对党忠诚，对党要有信心。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要有吃苦耐劳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据银川党史网）

## 陕甘宁边区的婚姻立法与实践（上）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开始着力推行婚姻制度改革。边区政府根据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基本原则进行了婚姻立法，并在法律实践中不断完善婚姻条例以解决各方面冲突，保障了男女双方在婚姻中的权利。

### 陕甘宁边区婚姻立法的基本原则

陕甘宁边区的婚姻立法延续了1934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和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关于婚姻立法的基本原则。

婚姻自由原则。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自主自愿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干扰。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第二条和第四条规定：“男女婚姻以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招赘。”1944年颁布的《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男女婚姻以自愿为原则。”1946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男女婚姻

以自愿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强迫包办，及买卖婚姻。”由此可见，婚姻自由原则主要规制包办和买卖婚姻的陋俗，贯穿于不同时期的婚姻条例，在边区婚姻立法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夫一妻原则。一夫一妻是指夫妻双方不能同时有两个及以上的配偶。1939年《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第三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1944年《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1946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第一条规定：“男女婚姻以自愿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在一夫一妻原则指导下，“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现象逐渐减少，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也相应减少，社会更趋稳定。

男女平等原则。男女平等是指女性和男性在政治、社会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具体到婚姻生活，是指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十二条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

的地位。”1939年和1946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以及1944年颁布的《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男女平等”，但是它们都赋予女性提起离婚的权利，推动了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 陕甘宁边区婚姻立法的实践冲突

婚姻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的具体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冲突。其中，离婚冲突、新旧婚俗冲突、抗日军人的婚姻冲突较为常见。

离婚冲突。陕甘宁边区的婚姻立法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为基本原则，在赋予女性同等提出离婚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双方可以提起离婚的条件。因此，边区还女性提起的离婚案件不断增加，且以贫农家庭居多。“根据1944年绥德分区对请求离婚当事人成分的统计，在33件离婚案件中，贫农有25件，中农有5件，工人有2件，富农有1件，地主则没有。”这也造成了边区法院机械按照婚姻自由原则进行判决的结果，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对于贫穷家庭而言，离婚还

意味着夫家为娶妻所耗费的财力物力将付诸东流，因此导致冲突不断。

新旧婚俗冲突。彩礼作为边区盛行的传统婚姻习俗，并没有统一的规格和标准。20世纪40年代，由于性别比例失衡进一步加大、边区通货膨胀等原因，彩礼价格急剧上升。有些女方父母贪图高额彩礼而为女儿订立婚约，这类现象的本质就是买卖婚姻。但在陕甘宁边区的婚姻条例中，买卖婚姻被明令禁止。因此，买卖婚姻与彩礼之间的模糊界线导致在实践中极易引发冲突。

抗日军人的婚姻冲突。在战争不断的环境下，边区军婚有其特殊性。婚姻条例一方面要稳固军心，保证前线抗日军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要照顾抗日军人的家属，保障其基本生活。但是，由于战争具有风险性，抗日军人何时能够回家并不能确定，部分家属就会选择离婚、另嫁、招夫等。这些方式虽然能够临时解决抗日军人家属的问题，一定程度缓和家庭矛盾，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势必会产生冲突。（据《人民法院报》）

## 历史上的宁夏毛毯（二）

当时，由于产量有限，供不应求，宁夏省毛织厂对栽绒地毯产品实行“统一推销，不准零售”。1941年2月4日,《宁夏民国日报》刊登消息曰:“宁夏省毛织工厂现奉省政府令所有该厂栽绒地毯自本年2月起统一推销,不再零售。闻该厂业于昨日(3日)通知各机关。”同日,宁夏省毛织工厂在《宁夏民国日报》刊登《启事》曰:“本厂奉省府命令,栽绒地毯统一推销,不准零售。嗣后,各友好在本厂定做地毯者一概谢绝,希即鉴亮为荷。”

1942年9月初,蒋介石来宁夏视察期间,在参观兴夏织呢厂时,“浏览各种产品,颇赞许”。马鸿逵当即奉送蒋介石宁夏织呢厂出品的“各种毛毯500条”。蒋介石“以该厂在物资困难之际,能利用后方人力及当地物产,而出产大量成品,颇不易得,特赏赐该厂补助费120万元,以资充实后方生产建设”。

蒋介石返回重庆后,对兴夏织呢厂之努力,特致电予以“特别嘉勉”。后来,随着宁夏毛毯产量的逐渐增加,在限制宁夏本地零售的同时,宁夏毛织工厂用“汽车满载各种毛织物及地毯等赴西安等地出售。”

### 六

由于宁夏毛毯驰名中外,凡来过宁夏的国内外人士对宁夏出产的地毯极为青睐,赞誉有加,而使宁夏毛毯声名远扬。

1918年11月,林竞来宁夏考察

时记述道:“栽绒毯,为此间特产,小工厂共20余家。所出物品,如地毯、马褥、台布、椅垫、炕褥子等,绒长花美,胜于包头及新疆之所产。惜均零星织卖,无大宗输出。毯之价格,普通每平方尺约7钱左右。其优劣视纬之多寡而分,最佳者每平方尺120纬,次100纬,又次80纬。”

1933年,国民政府实业部派员对西北宁夏等地物产进行调查,指出:“织毯业则因宁夏所产之羊毛细软可爱,其制出之成品亦较西北各省为佳。”

1934年,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傅作霖派赴宁夏工作与考察,指出:“宁夏向无机器工业,手工业之最有成绩者为栽绒毛毯,花纹精美,远近驰名,实为本省之特产。”

1934年,张中岳来宁夏进行调查,关于“宁夏出产”,指出:“栽绒毯:系用羊绒线织成,上缀以人物、花卉,并着以各种色彩。每毯一条,可用数十年,已久为中外人士所称道。”

1934年,孙翰文来宁夏调查,指出:宁夏“最著为毛毡、花毯出品,颇精致,产额现逐渐增加。花毯以褐色者居多,有粗、细两种,粗者可以御寒,细者中嵌微孔,犹可祛暑。取价之标准,视绒线之多寡而定,最上者每平方米120纬,次者每平方米七八十纬。……近年输出各地者颇多,将为本省输出品之大宗。”

1934年9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派专员张其驹(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任美镔(研究实习员)等

来宁夏调查,指出:“宁夏栽绒毯向称著名,各县亦有小规模之毯房,利用当地羊毛织造粗毯,宁夏县所产尤佳,织工、染色为西北冠。”

1936年,易海阳来宁夏调查,指出:“宁夏毛毯尤以栽绒毯为佳,图案新鲜,织法甚精,每毯可用二三十年之久,尤为人所称道。”

1937年6月,美国记者哈里逊(哈里森·福尔曼)等人在宁夏省城(今银川市)参观考察期间,特前往参观了宁夏地毯织造工厂,并拍摄了极为珍贵的宁夏工匠地毯工艺加工过程的照片。

1939年,张君实来宁夏调查,指出:宁夏“特产中的栽绒花毯,因其花纹精美,远近驰名,所以产量也很丰富。……定价的高低,也是看纬线的多寡而来决定,最好的每方120纬,次点的每方100纬,再次点的每方80纬不等。”

1942年10月,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团在宁夏毛织厂考察时,对宁夏毛织品优良颇为赞许,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特赠送该团团员每人毛毯一条”。

考察团成员、工业经济专家胡元民指出:“(宁夏)以毛纺织工业较为发达,共有6家,而以兴夏织呢厂稍具规模。……每日可出产毛毯40条,军毯100条及地毯50平方尺。后者(地毯)系手工出品,精细美观,驰名中外。”

194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畜牧系主任兼州立农场场长蒋森等人来宁夏考察,

认为:“该省生产制作地毯之羊毛最为重要,饲养绵羊之主要为出产制作地毯之毛……出产地毯、毛料及最优美之白色皮袍已著名全国。”其拍摄的“宁夏地毯”照片题注曰:“该省编织的许多地毯质量、设计和颜色都很出色。地毯制作是草原重要的家庭产业,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商业化。”

1944年7月,农林部宁夏农业调查团团员、农业经济专家董正钧调查指出:宁夏“名贵之地毯亦易(贸易)西售欧陆,南销各省及南洋,并易(贸易)跨境而赴美。”

1947年七八月间,来宁夏主持邮政局工作的郭玉峰指出:宁夏“栽绒毯,色泽鲜艳,质料极佳,出品冠于全国。制毯者约120余家,惜均为手工业,无机器设备,不能大量制造,洵为遗憾。”

综上所述有关史料记载,宁夏毛毯始始于清乾隆年间,盛名于民国时期,然因手工制作,需时甚久而成本昂贵,故产量有限,供不应求,可谓宁夏珍贵之特产。正如1943年7月,兰州电池厂副主任王雅文等来宁夏考察,在参观织毯工厂后,认为:宁夏“主要产品为毛毯及栽绒毯,间及毛织衣料。余等曾经参观,此厂有织毛毯木机60架,裁绒工人数十名。毛毯图案、花样繁富,色彩艳丽。栽绒则任何图样均可照样裁制。更有剪花一种,为先裁成平毯,然后用剪刀依花样剪出,仿佛浮雕,最为优美,不愧名著全国也。”(据《宁夏文史》)

## 移民岁月

第一百零三期

YI MIN SUI YUE

## 一生追求唯丰产（一）

许存远 口述

农垦老领导柳登旺开会总爱抬举我，说只要到连湖看到田边有个背着黄书包、卷着裤腿、光着脚、拿着钢卷尺的人，不用问，准是老许。其实学农搞种植的么，不围着田间地头转，那就叫不务正业。

我是河南省清丰县人。1924年1月生人，1948年在河南国立一中毕业，考入了西北农学院农学专业。1952年毕业分配到宁夏，先分到王大堡试验场。当时就有个想法，学农业技术的，适合在农业栽培一线，能发挥自己所学的专长。在科研单位，理论多，实践少，那时农场人员配备、仪器、机械等比农村先进。在农场搞科研，生产、示范、推广一手抓，什么都有。有了新技术，就可以实验、示范，成功了可以马上推广。理论和实践容易结合，所学的专业有用武之地。因此，我愿意到农场，在大田里摸爬滚打。于是就跟另一个同学对调，换到灵武农场。1954年6月，农垦又开辟了新战场，我被调到连湖农场搞规划、筹建工作，成了第一批建设连湖农场的员工之一。

刚去农场，那种荒凉景象，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一片盐碱滩，就是人们常说的“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从外边到农场，没有路，要从永宁李俊到邵岗，然后脱掉鞋，淌水才能到连湖。这里只有十几间破旧的房子，算是场部的办公室和库房，没有一间宿舍。我在距场部1公里外的老家乡租了间小土屋。晚上就在土台子上点一盏煤油灯，一边轰赶蚊虫，一边整理资料，常常一干就是大半夜。

对于新建的连湖农场来说，盐碱滩上种水稻，芦苇难除是最大的课题。上大学时，我学的是小麦和棉花的栽培技术，对于水稻的生长规律，尤其对芦苇湖里和盐碱滩上种水稻了解甚少。为了铲除芦苇，只有拜师学艺，四处专访，请教当地老农，总结前人的经验。终于钻研出一套通过耕作措施灭除芦苇的方法。1958年，连湖农场田间芦苇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到农场工作，再就没有在王大堡科研单位的星期天、节假日概念了。虽然条件很艰苦，可那时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有机会一试身手，

## 支宁教师 西行铺路

——记宁夏大学原校长张奎（六）

张奎：原来银川师范有两个工人有以前做过点泥瓦匠活，砌墙、打地基都是他们带着我们干，在上房梁时我们几个学物理的有了施展的机会，又逼了一次能，因为上房梁，装门窗都用得着力学原理，指挥劳动的两个泥瓦匠还说这帮碎娃日能得很。开始听不懂，感觉他们是在骂人，后来才知道是在用方言夸赞我们。

宁夏大学是1958年9月15日成立，比自治区成立早了一个月，关键原因是新生已经到校。最早的宁夏大学由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医学院、农学院组成，师范学院开设有中文、历史、数理三个专业，三个学院的学生加起来也有300来人，是借用老银川师范的几所教室办学。

1960年后新校址才逐步建成。刚开学时学校就分步给张奎一项比带课还难的特别任务，让他去北京采购图书、教具、实验器具，还要再挖些有经验的老教师。派他去的原因是领导知道他在北师大时比较活跃，人缘好，家又在北京，可以省去些住宿费用。在之前的建校劳动中他比较“日能”，给老校长刘继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者多劳也在情理之中。

张奎：到北京采购图书、教具和挖老师的工作完成得不漂亮。那时候全国都在大跃进，新建的大学很多，有的省一下子冒出来好几所大学，还有很多地方办了工人大学、农民大学、劳动大学，所有的图书都十分紧缺，特别是专业性强的课外读物很难找到。只能委托北师大图书馆和熟悉的老师帮着办，去的时候带了六万块钱，这在当时可真是笔巨款，图书这方面主要是找不到，教学和实验器材主要是没

把自己学到的农业技术与生产实际相结合。通过实践来检验，改变眼前农场荒凉的现状，以实现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抱负。

从1954年建场到1989年退休，我是一步也没离开过连湖。35年在连湖农场，我和同事们经过实践，提出了改土治碱、培肥地力、种稻洗碱、科学轮作、暗沟排水、淤洪压碱、整治地条、缩小灌面、挖疮填肉、秸秆还田等实用有效的农业技术和措施，把连湖的荒碱滩改造成了土质肥沃、高产稳产的万亩良田。

搞科研最怕的是分心，但人生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注定要尝遍酸甜苦辣。我结婚娶的是河南老家的姑娘，叫刘俊峰。我们两家离得不远，有六七里地。她中学毕业以后，我把她接到连湖，她又上了宁夏技校。毕业后，就在连湖当文书、化验员。两人结婚后感情很好，然而甜蜜生活才刚开始，就被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折腾得家里阴云密布。1957年反右，我被列入逮捕名单，“四清”运动被洗所谓“滚水澡”，进行批斗。再到后来成了“群专”对象，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所有这些，使本性善良又胆小的老伴一次次受到惊吓，惶惶不可终日。再加上老伴母亲在这节骨眼上去世，考虑到当时情景，怕她承受不起这双重打击，便对她隐瞒了此事。孩子又小，我又忙，没有时间送她出远门，只是给家里寄些钱。后来她知道了，觉得自己不孝，对不起母亲，导致老伴病情加重。经北京一家医院确认为“妄想型迫害狂”，属精神分裂症之一。先后在区内外多家医院求治。这样一来，家庭重担就落在了我一人身上，当时有多难是可以想象的。上班忙工作，回家照顾老伴和年幼的孩子。

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专业知识、科研成果和踏实的工作态度，农场职工群众都看在眼里，觉得一个知识分子，能像老农一样和职工群众打成一片，就很简单了。掌握农场每一块地情况，挨斗也没有放松抓生产。所以每次批斗，都有职工群众的保护和一些领导的暗中关照。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有货，甚至连上物理实验课的基础电路板都难找到，最后北师大支援了我们一些东西，宁夏是边疆省份，国家有过号召，让全国大力支援边疆，所以我们向北大张口也有点理直气壮又有点厚着脸皮，北师大对支援宁夏还是有热情 and 觉悟的，只要我们开口，都会尽力帮助。最大的成绩是请来了一位很好的物理老师张德激先生，张先生当时年龄也不大，比我大七八岁。头脑里也充满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激情，我们在北师大读书时他就给我们带过课，他一听说宁夏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就主动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投奔了宁夏，这件事很让我感动。在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我请来的张德激老师也要跟着饿肚子，从内心讲很感觉对不起张老师。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校园里遇到我都不好意思，有时候见他迎面走过来还会绕道避开。回到学校后刘继曾副书记听我汇报情况后没有批评我，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我，我知道，他更多是对我的鼓励，因为他也知道当时全国的情况。

采购工作结束后张奎赶上了宁夏大跃进的尾巴，参加过学校组织的炼大钢铁、制作芒硝和速效肥生产，有的具备了成功的条件，但终因没有规模或没有销路走向失败。大炼钢铁浪费了不少时间，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在总结失败时张奎说：冲动不等于科学，仅凭建设美好社会主义的愿望而没有科学的支持是无法达到目标的。最后大炼钢铁终止了，芒硝制作没了音讯，速效肥难以投产。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的风头很猛，浪费了很多人力、耽误了很多时间、又浪费了很多钱。（**蒿根生** 撰稿）